

杜月村
著

楚

辞

新读

巴蜀
書社

楚辞新读

杜月村 著

巴蜀书社

20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新读/杜月村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1. 8
ISBN 7-80523-868-5

I. 楚... II. 杜... III. ①楚辞—译文②楚辞—注
释 IV. 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154 号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设计:刘 伟

楚辞新读

杜月村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00 千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80523-868-5/I·361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次

导言	(1)
离骚	(36)
九歌	(89)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九章	(136)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天问	(210)
招魂	(244)
卜居	(274)
渔父	(281)
九辩	(286)
吊屈原	(310)
招隐士	(316)

导 言

—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产生的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的三百年间诗坛冷落、寂寞的形势，唱出了更加美丽、嘹亮和悲壮的歌声。它不但响彻了南国的山河，而且广播于中原的大地；它不但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而后的一座光焰万丈的丰碑，而且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一座光焰万丈的丰碑。故刘勰说：“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鲁迅也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汉文学史纲要》）其衣被词人的作用，将是千秋万代的事。

秦汉间，人们对“楚辞”的传唱一直不衰。到了汉代初年，又有了新的发展。汉高祖刘邦是楚人，会唱楚歌；他的宠姬戚夫人会舞楚舞。唱楚歌伴楚舞，固一时之盛。特别是他的一曲《大风歌》，确有楚声十足的韵味。“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马上得天下，多么踌躇满志；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却又不免有点身后感慨的悲哀。正是在汉高祖的影响下，西汉初期的几个皇帝对“楚辞”都很重视。《汉书·淮南衡山济北

王传》说：“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时汉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无疑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王室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据有政治、经济的优势，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是很不简单的。可能就在这时，袁辑屈、宋作品，已编成了“楚辞”的初稿，所以，在“旦受诏，日食时上”，得以很快交卷，自非偶然的事。

汉武帝不仅使刘安为《离骚传》，还下诏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史记·酷吏列传》说：“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同事，也见《汉书·朱买臣传》：武帝召见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汉宣帝为承武帝事业，也关心“楚辞”。《汉书·王褒传》说：“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不论把“楚辞”与《春秋》并提，或把“楚辞”与六艺群书同论，都说明“楚辞”当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体在传述，而是有了一个可供言说、讲论和诵读的底本。这底本很可能就是淮南王刘安所主编的“楚辞”的初稿。可见“楚辞”在当时已成为专项热门课题，朱买臣、九江被公等已成为研究“楚辞”的一流专家。

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在“楚辞热”盛行时，一些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从事“楚辞”体创作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固是较为突出者，有的“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就显得很卑下了，但他们对楚辞这种文体的宣传和扩大影响，都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到了西汉末年，刘向为校中秘书，整理屈原、宋玉诸人作品，加上他自己作的一篇《九辩》，合编为一部《楚辞》专著，流行于世。东汉王逸又以这个底本作注，辑成《楚辞章句》一书，这就是今天所见最早的一部《楚辞》注本。

二

在中国诗坛上与日月辉映的《楚辞》，是源远流长的。从宏观分析，它是中国南北传统文化复合的产物；从微观考察，它又有其诗歌自身主客观多元因素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据称楚国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鬻熊之子事周文王，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西周时代，北方君主诸侯，把楚国视为没有开化的南蛮，周宣王南征楚国的叙事诗就说得很明白：“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显允方叔，征伐玃狁，蛮荆来威。”（《诗·小雅·采芣》）不但骂荆人为蛮子，而且视同蠢猪。玃狁是要征伐的，但毕竟不像对荆人的态度。时代稍晚的《鲁颂·閟宫》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把南方的荆舒和北方的戎狄同样看做是膺惩的对象。孟轲是有文化教养的诸子之一，也说楚国是“南蛮貊舌之人”（《孟子·离娄上》），不给以应有的尊重不算，连人格都给侮辱了。楚人也不忌讳，坦然自称为蛮夷。《史记·楚世家》说：“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伐随，

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蔽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这蛮夷的气魄可真不小，挟其蔽甲优势兵力，欲以观中国之政，竟然要求王室为之尊号了。

楚国的文化与周民族同源，同样受殷商文化的影响。但周民族因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北方文化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而楚人僻处南国，其政治、经济及其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北方来说，就显得较为落后了。

楚国创始时期，人民的生计是相当困难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篳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但楚人不畏艰苦，不怕强敌，他们意气风发，在西周时代，就扩展势力；到春秋时，军事政治日益强大。楚庄王时，已成为五霸之一，观兵河上，问鼎中原。昔日被称为蛮子的楚人，一跃而为中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纵横捭阖，声威显赫。当时分处于江、淮一带的大小国家，均先后合并于楚。那些“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形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局面。

楚国的版图扩大了，与周边小国和北方诸侯国的外事交往与日俱增，会盟聘问的国际活动也日趋频繁，南北文化交流已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楚国对中原较高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思想意识，都采取大量吸收的方针，但不默守北方诸夏文化发展的模式，而是扬长避短，建构有楚国特色的楚文化，以显现楚文化的鲜明性和独创性。

由于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宽松的国际形势，南方的学者到北方

去留学取经的，北方的人士到南方观光旅游的都多起来了。人际关系的密切，思想意识的交融，文学艺术的感染，都促进和加速了楚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派到北方去留学的学者，努力学习，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陈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看不起“南蛮馮舌之人”的孟子，也不得不改变他的偏见，给陈良以高度的评价。他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上》）

春秋时代，诸侯国间会盟及外交场合，流行赋诗言志的风气，赋诗得当否往往影响外交事务的成败。故孔门把《诗经》列为必修科目，以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和使于四方、善于专对的外交官。楚国君臣上下，也不甘落后，把一部《诗经》读得很熟，在内政外交的政治场合，能熟练地引《诗》据典发表政见。这里但举两例来谈：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子认为：“武王克商，作《颂》（《周颂·时迈》）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周颂·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这两首诗言周武王诛纣，致定其功，并息兵修德，故能有信而王保天下。所以，他深有体会地说：“夫武（周武王），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他联系自己对比起来，找出差距说：“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

功也。”楚子读诗体会很深，大大地提高了对政治、经济、军事的认识，认为为政以德，在“安民、和众”；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才能“保大、定功”。不迷信武力，乘人之危，进行掠夺，于是取消了对晋国的战争。《左传》说：“楚庄有礼，所以遂兴。”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楚选罢（pí 皮）到晋国去参加盟会，晋侯设宴招待他。将离开时，他赋《既醉》（《大雅》）诗曰：“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主题在叙述西周盛时，王者祭毕飨燕，而公侯祝福之诗。选罢赋之，把晋侯比之太平君子，会享大福，表示崇高的赞颂和深切的谢意。叔向对他这一表现很有好感，赞赏说：“选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认为他将来在政治上是一位大有希望的人物。

楚国君臣，对《诗经》熟读深思，能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真是儒雅风流，为一时之盛，不但不逊北方诸国，甚或过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惠栋说：“周之典籍尽在楚矣。《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观射父读之，而楚《杗杌》之书颇可观。《国语》采之，流入屈、宋，而楚骚比于周雅，书之益人如是乎！”说明这是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对楚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学艺术都有很大的影响，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或谓“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人不之信，姜亮

夫先生则认为“文化传播，事有必然，而其移人神思，亦势所必至。”可以想见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影响由来已久了。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诗歌总集是《诗经》，继而出现的是《楚辞》，它们时有先后，地有南北，其间有无什么关系呢？

闻一多先生说得很明确，两者间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历来总喜欢把它们连成一串，真是痴人说梦。”（《闻一多全集·屈原问题》）姜亮夫先生有一个与闻氏相似的论点，他说：“《三百篇》者，河域英灵之作，屈、宋赋者，江汉南金之文，其情实两异，则两不相涉者，其正也。诗无楚风，宜乎！宜乎！”（《楚辞学论文集·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又说：“屈原肯定读过《诗经》，但屈赋有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路子，远远超过《诗经》的水平。屈原是楚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开创者。因此，我的讲法是：不要把《楚辞》作为《诗经》的后继，而应该是把《楚辞》与《诗经》并列。”（《楚辞今绎讲录》）

当然，《诗经》富有中原文化的色彩，《楚辞》具有南国文化的风骚。它们在创作方法、主要倾向和诗歌样式方面，都各有不同的特征，但在南北历史文化的积淀、交流、交融中，必然给文学历史的创作以不同程度的联系和或深或浅的影响。就文学作用和审美意识来说，《诗经》和《楚辞》也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特点。它们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能看成两不相关的绝缘体。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部》说：“《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按楚庄王之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

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他从诗歌“兴观群怨”的精神实质上说明《楚辞》与《国风》、《小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合理可取的。我们就语言而论，或谓“兮”字广泛运用的句式，为《楚辞》骚体诗特有的标志，这固然是事实，但也不应忽视，在《诗经》里，“兮”字的运用也早已有之。有每句用的，有隔句用的，有隔二三句不等而用的，有用于句中的，有用于句尾的。至于北方的《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采薇操》：“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或过故殷墟，不胜宫室禾黍之悲；或饿死首阳义不食周粟之操；或告别易水，怒发冲冠之歌，何尝不带有“兮”字的咏叹调，与《楚辞》有某些相同的韵味。就字句语法结构来说，《天问》的四字句式无异于是《诗经》雅、颂四字句的化身。如果以《怀沙》为例，把它开头四句的“兮”字去掉，就成为典型的四言诗：滔滔孟夏，草木莽莽。伤怀永哀，汨徂南土。”当然，应当看到，“兮”字在《楚辞》中用得比较广泛、整齐和复杂，在表情达意的层次有更深化的作用，而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楚辞》从《诗经》演变发展而来的轨迹。

即使就诗歌的风格意境来说，《楚辞》与《诗经》也不是没有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例如《周南·汉广》，它是江汉流域民间流传的男女相悦之诗。或者说是一个樵子刈楚刈葵之歌。他歌唱一个天姿绰约、缥缈于汉上林木之间的游女，再三求之而不可得，爱慕之情反复咏叹，响应林谷，赋予人美的享受。从汉上游女的

形象，不就仿佛看到了湘水女神的情影么？

我们说《楚辞》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诗经》语言流风余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楚辞》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不同于《诗经》的特异的风貌。它是在南国文化土壤和江湘风雨滋润灌溉下茁壮成长起来的鲜艳夺目、震烁今古的奇葩。宋黄伯思《翼骚序》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诮、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对《楚辞》的基本特征作了一般概括性的描述，下面拟作一些补充。

南方乐歌，源远流长，有的怀旧，有的抒情，有的济世，有的出尘。虽极简要，都各具特色。

这时先介绍南音。《左传》成公九年传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楚人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为了保持国格和人格的尊严，他操南音歌唱自己的祖国以抗衡，使敌人为之动容。可以想见南音感人力量之深。《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命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相传夏禹治水，南经涂山时，与涂山氏女一见钟情。婚后不几天就因公出巡，久去不归，涂山氏女成了“留守女士”。每朝晨月夕，但见涂山不见人，于是“啊哟”作

歌，以抒发渴望的情怀。其词简单，可寄情无限；其调婉转，而徘徊缠绵。反映了楚歌方言和声乐的特点。

带有政治色彩的楚歌有大约春秋中期的《子文歌》和《楚人歌》。《子文歌》：“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刘向《说苑·至公篇》说：“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黜廷理而尊子文，使为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子文执法严明，不以权谋私，在国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故国人作歌歌颂他的德政。至于《楚人歌》，则是歌颂一个田野小民诸御己的事迹。楚庄王建筑豪华型的层台，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百姓不堪重负，提意见的大臣有七十二人都被处死。有农民诸御己，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大胆正面地向庄王畅述，当今和过去历史上大批有国者不倾听臣下谏诤而亡国破家的惨痛经验和教训。庄王为之震动，遂解层台之役而罢民，楚人感恩戴德，作歌歌颂诸御己。歌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论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论无人乎！”以其大胆直谏敢言，刘向把他载入史册，作为《说苑·正谏篇》的题材。两歌富有政论色彩，也可说是最早的政治化的楚歌。其风格明快质直、简朴，但句法尚未脱四言诗式的因袭之路，其叙事兼赞颂的这种创作方法，于以后的《楚辞》也许有一定的影响。

到春秋后期，楚歌随楚文化的日渐成熟的机遇，而突破旧的传统格局，走上革新的道路。如刘向《说苑·善说篇》的《越人歌》，就是一篇创新的划时代的作品。“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谄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鄂君子皙，泛舟越溪，船夫越人用越语三十一个字拥楫而歌。鄂君不懂，特请人用楚语译出，这位译员不但深谙楚越两国语言，且有高超的文学修养，是译诗，也是他的再创作。这首民间恋歌，声情并茂，委婉动人，其美学价值与以后的《九歌》中的作品相比，非但毫不逊色，甚或在《九歌》中某些作品之上。

与《越人歌》同时或稍后的有刘向《新序·节士篇》的《徐人歌》、《论语·微子》的《接舆歌》、《孟子·离娄》的《孺子歌》。

《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这首歌，是叙述延陵季子北访晋国，路过徐国时，徐君很爱慕他随身携带的宝剑，季子因有访问上国的任务，未便献上，然已心许。待季子完成出访任务南归时，徐君已死于楚，季子把那宝剑挂在徐君墓树而去。徐人为感谢季子重感情、重义气的高贵品质，作歌以表示赞美之意。两句长短参差，有咏叹不尽的风韵。

《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入楚，楚狂接舆故意在路上唱这首歌给孔子听。他认为在今天这倒运的时代里，你就算了吧！今天要搞政治是很危险的啊！他以避世的思想与入世的孔子唱反调，他自视甚高。当孔子停车想向他请教时，他却拔腿溜了，弄得孔子很狼狈。

《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首小孩唱的歌，是孔子在楚国听到的，他也许觉得很有人生的哲理，便马上叫他的学生记住：“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

《接舆》、《孺子》两歌，大约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前者具有出世思想的理趣，后者有因物起兴的遐想。音韵有所变换，句法有所创新。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

至于《招魂》里提到的《阳荷》（《文选》李善注作“阳阿”）、《涉江》、《采菱》，《大招》里提到的《劳商》，宋玉《对楚王问》里提到的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只见篇名，不见歌词。普及型的《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提高型的《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也有数百数十人。可以想见，楚歌在诗歌史上发展的轨迹，在社会上流传之广泛，其成为《楚辞》的渊源，也就不言自明了。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历史，也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摇篮。《楚辞》之所以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既有借于高山大泽、烟云变幻的江山之助，也有赖于神话传说异彩纷呈的魅力。我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是一个富有神话传说的国家。可是，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南北神话传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北方重人事而疑鬼神，重实际而黜玄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学生季路问事鬼神，他教训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因此，把“六经”都当成历史，把美丽的神话变作他宣传说教的教科书。譬如，鲧、禹平治洪水的神异事迹，在北方文化的典籍中就完全把他们“历史化”，作为古圣帝加以歌颂。又譬如，帝舜这样至孝出于畎亩之中，卒有天下的历史人物，在南方的文化典籍中，传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为之痛哭流涕，以涕挥竹，竹尽为之斑。神而化之，富有感人的力量。唐人高千里咏斑竹诗说：“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

间。当时珠泪知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可以想见斑竹故事感人之深。毛泽东同志《答友人》诗说：“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他运用哀婉的神话故事，为抒写“红霞万朵百重衣”的美好的现实服务。说明神话之于文艺创作的生命力，是历久不衰的。

《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章句·九歌序》：“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这种人神杂糅、巫术宗教迷信的风俗之长盛不衰，丰富着人们的想象力，不断地孕育着神话与故事的传说。从《山海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神话都大量保存在楚国。楚人利用这些丰富的神话传说，挥洒于笔墨之间，或写女娲化生万物的形象和神力，或写夸父追日、鲧禹治水的战天斗地的愿望和智慧，或写刑天舞干戚、赤帝失瑶姬的冲突和变化。举凡历史舞台上的成败兴亡，政治场合中的荣辱得失和人生旅途中的悲欢离合等等，都无不在楚国的神话世界里找到若隐若显的影子。至于《九歌》中声色娱人的灵巫，《离骚》中高不可攀的天国，《招魂》中恐怖吓人的幽都，以及《天问》中古今天地的玄想，无不为屈原艺术题材的构思，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空间。真是笔落惊江山之风雨，诗成泣祠庙之鬼神。难怪光焰万丈，要古今独步了。

《楚辞》，除了得到神话传说的哺育成长外，还有赖于高山大泽、烟云变幻的江山之助。楚国地处南方，地理特殊。有火延玄颜的云梦，有波涌连天的洞庭，有巫山峡谷的奇险，有衡岳高山的神异，有望涔阳之极浦，有横大江之扬灵。这些自然之美，都有陶冶性灵的作用。王夫之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